

# 数字化治理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李志福

(浙江工商大学机关党委,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数字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高等院校的两个重要命题。基于高校高质量发展内涵,利用国内高校公开面板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高校数字化治理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校数字化治理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部分影响,其中数字化治理对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对社会服务没有明显影响;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部分调节作用,其中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数字化治理对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正向作用,对数字化治理与社会服务的关系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结论拓展了高校数字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与理论,为高校推进数字治理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数字化治理;高质量发展;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G647; TP39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02-0026-04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02.009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 引言

高校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核心场域,在需求牵引与政策赋能的双重推动下,其数字化建设与治理体系深度融合的成效已成为教育现代化转型的标杆性实践。当前,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目标下,高校亟需以数字化治理为支点,突破资源整合壁垒、优化教师数字素养结构,并构建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体系,从而系统性缓解教育变革冲击,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然而,高校数字化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数字治理项目问题导向不清,对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合作交流等有效支撑力度不足,数据监管制度体系与部门机构不完善,对技术企业依赖程度较高等问题,这对新时期高校数字化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截至目前,探索数字化治理对高校发展实际影响的研究非常匮乏。一方面,现有研究对高校数字化治理与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探讨仍处在宏观层面,仅有少量高校数字化治理研究集中在定性分析高校数字化治理的概念、意义、理论逻辑、实现路径等方面,少有研究从微观量化角度展开分析,难以对高校具体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高校数字化治理问题与高质量发展问题均具有复杂性、模糊性、难测量性等特点,少有研究具体探讨以高校为主体的数字化治理问题。因此,本文致力于破解高校数字化治理如何影响高校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问题,从微观量化角度实证分析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检验高校所面临的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以弥补现有研究不足,为我国推进数字化治理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发布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第11条指出:“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应包括高等教育的所有功能和活动:各种教学和学术计划、研究与学术成就、教学人员、学生、楼房、设施、设备、社会服务和学术环境等。”其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包含范围进行了宏观界定。当前,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研究上,学者普遍认为高质量发展中的特色和质量侧重回答特色“强不强”和质量“优不优”的问

题。在高校数字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上,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可以成为高校系统内生发展模式的重要推手。钟晓敏(2020)辨析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及其相关概念的异同,认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将高质量发展理念渗透到教学、研究、服务等学术活动领域,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律的客观要求。基于以往研究并结合高校职能,本文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剖析数字治理水平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一)数字化治理与人才培养

首先,高校数字化治理为高校解放教学生产力与学习生产提供了前提条件。高校能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在组织架构层面能够通过多方数字基础设施赋能行政管理,有助于减少师生获取信息与重复工作的成本,激发教师教学创造力与学生学习活力。其次,高校数字化治理有利于培养人才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精准化。当前人才培养不再局限于“学到了什么”的知识传输思维,而是侧重于“获得了什么能力”。高校能够依据师生信息构建基于个人信息、学习特征、社交网络的数据库,通过优化调整模型参数,服务于不同教育教学场景,实现个性化资源服务,使人才培养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第三,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能够推动高校创新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高校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与反馈的数字化机制,降低人才培养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扩大人才培养工作的深度与广度,进而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sub>1</sub>:数字化治理水平对高校人才培养具有正向影响。

### (二)数字化治理与科学研究

首先,数字化治理能够推动学术研究高效交流。研究者之间进行的知识、思想、成果、资源、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交流是学术研究的必要要求。高校开展数字化治理为学术科研领域提供了基于互联网络的合作机制。同时,学术研究逐渐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仅组成更多跨学科研究者团队并不是提升学术研究的有效方式。数字化治理为每一位研究者了解合作对象的专业、研究特长等提供了重要渠道,推动构建

收稿日期:2025-6-20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数字治理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202455970)。

作者简介:李志福(1983—),男,福建南安人,浙江工商大学机关党委高级经济师,主要从事数字治理、绩效评价研究。

跨学科合作的研究网络。其次,数字化治理能够激发高校科学研究实现“无边界触达”。数字化治理有助于缓解高校与社会的边界,建立起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的接续纽带;同时,数字化治理能够纾解科学研究过程信息传递失真、科研过程难以真实反馈的难题,将物理世界的主观反馈和客观感知数据化,使得数据能够直接触达科研信息获取的个体。第三,数字化治理有利于激发科研团队成员的内在科研动力。数字化治理水平越高,高校利用数字化输出资源与服务环节越多,从而能搭建完善的数字化建设体系,规范教师职称评审、需求反馈等办事程序,缓解科研团队中搭便车现象,激发团队成员科研动力与热情。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sub>2</sub>: 数字化治理水平对高校科学研究具有正向影响。

### (三) 数字化治理与社会服务

首先,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越高,高校内部监督与社会外部监督的渠道越通畅,有助于高校及时主动检测运行风险,更好地展开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其次,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越高,越能够建立起校务服务事项与社会服务事项的融合机制,有助于缓解校内职能部门风险分担、利益分配问题,克服信息孤岛下互相推诿、不作为的弊端,促进高校科层组织优化、业务流程再造和服务方式变革。第三,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越高,越能充分发挥数据价值,改善以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普遍开花”型流动服务方式,有助于高校有针对性地选择服务基地,提升社会服务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sub>3</sub>: 数字化治理水平对高校社会服务具有正向影响。

### (四) 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首先,科技型企业技术发展与企业创新能力直接相关,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创新。技术企业不确定性较大时,企业倾向于收益更快的“短平快”研发项目,限制企业将匮乏的内部资源分配给不确定性较大的长期项目,而高校与技术企业展开的合作多为收益周期较长、资金投入较大的研发项目,使得合作关系不确定性增加,阻碍了高校数字化治理引领高质量发展。其次,高校传统数字化建设模式“项目制”存在着指向性强、技术封闭、独占性强等弊端,一旦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系统更换新的合作伙伴,只能推倒重来,使得高校数据化治理出现运维困难、重复开发、业务不联动、数据不连通等问题,限制了高校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sub>4a</sub>: 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会减弱数字化治理水平对人才培育的正向作用。

假设 H<sub>4b</sub>: 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会减弱数字化治理水平对科学研究的正向作用。

假设 H<sub>4c</sub>: 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会减弱数字化治理水平对社会服务的正向作用。

## 二、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依托国内高等教育发展体系进行研究。依据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21年9月)》,剔除民办高校、专科院校等数据,采用随机抽样,随机抽取全样本库中50所高校作为研究样本。

本文变量数据来源如下:①自变量数据来源:数字化治理水平数据来源于《大数据蓝皮书: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②因变量数据来源:高校人才培养数据来源于高校年度毕业生就业报告公布的就业率数据;科学研究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公布的统计数据;社会服务数据来源于高校年度预决算公开数据以及《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报告》。③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来源: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教育部官方数据及国泰安经济数据库。

### (二) 变量设定

#### 1.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变量为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当前,地方高校数字化治理推进多靠当地政府拉动,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与地方政府数字化重视程度与数字化发展能力有深刻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分析了政府数字化发展:刘飞(2021)利用固定宽带接入数、移动电话普及率衡量技术条件表征治理硬环境;庞瑞芝(2021)在此衡量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数字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衡量数字化发展水平。与此测度方式相似,《大数据蓝皮书: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提出了“治理科技指数”这一指标,从制度保障、发展环境、支撑能力、场景应用、效能评估五个方面衡量国内各地区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应用能力与治理效能。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测度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即采用高校所在省市2018—2020年治理科技指数(Governance Technology Index, GTI)测度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

#### 2. 因变量

(1) 人才培养。本文选取2016—2020年高校综合就业率增长率(Growth Rate of Employment Rate, GRE)测度高校人才培养水平(Talent Cultivation, TC)。

(2) 科学研究。本文选取2016—2020年高校发文数量增长率(Growth Rate of Publications, GRP)均值测度高校科学研究水平(Scientific Research, SR)。

(3) 社会服务。借鉴王燕等(2016)对我国高校社会服务效率的测度模型,本文选取2017—2020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金额(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TSA)测度高校社会服务水平(Social Cooperation, SC)。

#### 3. 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将高校面临的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分为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与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本文使用2016—2020年技术市场成交额波动率(Volatility of Technology Market Turnover, VTMT)测度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

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的衡量相对成熟,本文借鉴申慧慧(2012)的研究方法,测度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具体方法如下:以省市为研究单元,以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年末主营业务收入作为因变量,以年度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通过OLS回归,以回归扰动项作为过去5年的非正常销售收入,除以过去5年销售收入的平均值,求出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再以同年度信息技术行业所有公司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的中位数作为行业环境不确定性,以未经行业调整的不确定性除以行业环境不确定性,得出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EU)。其中,行业分类来源于证监会2021年行业分类标准。

为防止遗漏其他与高校数字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变量导致估计偏差的问题,本文引入教育发展、政策引导、技术进步三个方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如下:①教育发展: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量增长率(Growth Rate of Teachers, GRT)、普通高校生师比(Student-faculty Ratios, SFR)。②政策引导:当地人均GDP增长率(Growth Rate of GDP, GDP)、当地教育财政投入增长率(Growth Rate of Educational Financial Input, GRI)。③技术进步: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率(Growth Rate of Enterprise Invention Patent Applications, GRA)。

### (三) 模型设定

为检验高校数字治理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模型1、2、3使用OLS回归模型检验数字化治理水平及控制变量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影响。其中,

$TC_{tpi}$ 、 $SR_{tpi}$ 、 $SC_{tpi}$  分别表示第  $t$  年  $p$  省份  $i$  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水平,  $GTI_{tpi}$  表示第  $t$  年  $p$  省份  $i$  高校的数字化治理水平,  $Controls_{tpi}$  表示第  $t$  年  $p$  省份  $i$  高校的控制变量。

$$TC_{tpi}/SR_{tpi}/SC_{tpi} = \beta_0 + \beta_1 GTI_{tpi} + \beta_2 Controls_{tpi} + \varepsilon \quad (1)(2)(3)$$

模型 4~9 使用 OLS 回归模型检验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其中,  $VTMT_{tpi}$  表示第  $t$  年  $p$  省份  $i$  高校面临的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  $EU_{tpi}$  表示第  $t$  年  $p$  省份  $i$  高校面临的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  $GTI_{tpi}VTMT_{tpi}$ 、 $GTI_{tpi}EU_{tpi}$  分别表示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变量。

$$TC_{tpi}/SR_{tpi}/SC_{tpi} = \beta_0 + \beta_1 GTI_{tpi} + \beta_2 VTMT_{tpi} + \beta_3 GTI_{tpi}VTMT_{tpi} + \beta_4 Controls_{tpi} + \varepsilon \quad (4)(5)(6)$$

$$TC_{tpi}/SR_{tpi}/SC_{tpi} = \beta_0 + \beta_1 GTI_{tpi} + \beta_2 EU_{tpi} + \beta_3 GTI_{tpi}EU_{tpi} + \beta_4 Controls_{tpi} + \varepsilon \quad (7)(8)(9)$$

(四)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观测数
数字化治理水平	56.382	2.677	62.995	49
就业率增长率	-23.373%	0.033	-21.149%	50
发文增长率	28.973%	0.086	18.753%	50
科技成果转化金额(亿)	2.356	0.512	1.220	37
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	22.867%	0.055	13.434%	49
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	0.288	0.009	0.301	49
专任教师增长率	2.966%	0.014	3.502%	50
普通高校师生比	0.021	0.010	0.020	50
当地人均 GDP 增长率	7.900%	0.012	7.554%	50
当地教育财政投入增长率	8.314%	0.082	8.986%	50
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率	6.209%	0.057	7.230%	50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其中,治理科技指数的均值为 56.382,中位数为 62.995,标准差为 2.677,说明样本中治理科技指数存在较大差异,侧面印证了各大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的异质性较大。其他各类指标的均值与中位数相差不大,标准差多在(0.01~0.5)区间内,说明指标波动性较小。

三、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分析

数字化治理水平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中,回归 1~3 分别包含自变量数字化治理水平(GTI)、人才培养(TC)、科学研究(SR)、社会服务(SC)与控制变量,以检验假设  $H_1$ 、 $H_2$ 、 $H_3$ 。回归 1 显示,治理科技指数与人才培养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b=0.910, p<0.05$ ), $H_1$  得到验证,说明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对人才培养具有正向影响。回归 2( $b=0.441, p<0.1$ )的结果显示治理科技指数与科学服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H_2$  得到验证,说明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对科学研究具有正向影响。回归 3( $b=0.664, p>0.1$ )中治理科技指数与社会服务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不能验证数字化治理对社会服务具有正向影响,假设  $H_3$  不能得到验证。笔者认为,回归 3 结果不显著的原因在于,社会服务多以政府挂职、政府咨询、产学研项目、公共设施共享、教育服务共享等线下活动为主导,而当前高校数字化治理侧重于校内高频服务事项线上办理、学校运行数据监测、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服务等,辐射

范围尚未包含所有社会服务项目,社会服务的数字化水平较低,致使数字化治理对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没有产生直接影响。

(二)调节作用回归分析

回归 4~6 在上述基础上加入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调节变量以及其与自变量的交互变量,回归 7~9 加入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调节变量以及其与自变量的交互变量,分别检验假设  $H_{4a}$ 、 $H_{4b}$ 、 $H_{4c}$ 。

回归 4 显示,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与人才培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b=-0.307, p<0.05$ ),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与数字化治理的交互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b=-0.775, p<0.01$ ),说明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对数字化治理与人才培养的作用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回归 7 显示,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与人才培养显著负相关( $b=-0.526, p<0.05$ ),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与数字化治理的交互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b=-0.022, p<0.1$ ),验证了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对数字化治理与人才培养关系的调节作用。假设  $H_{4a}$  得到验证。

回归 5 显示,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对科学研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b=-1.389, p<0.1$ ),且交互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b=-0.188, p<0.1$ ),说明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会削弱数字化治理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回归 8 结果显示,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与科学研究显著负相关( $b=-3.620, p<0.1$ ),交互变量与科学研究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b=-0.227, p<0.05$ ),验证了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对数字化治理与科学研究的负向调节作用。假设  $H_{4b}$  得到验证。

回归 6 显示,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对社会服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b=-0.369, p<0.1$ ),但是交互变量与社会服务之间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b=-0.441, p>0.1$ ),说明了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对数字化治理与社会服务的关系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回归 9 显示,技术委托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与社会服务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b=-2.286, p>0.1$ ),交互变量相关系数亦不显著( $b=-1.692, p>0.1$ ),无法验证技术委托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数字化治理与社会服务的调节作用。假设  $H_{4c}$  不能得到验证。针对这一结果,笔者更换回归模型并再次检验后,获得相同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 Heckman 二阶段模型进一步控制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模型 1~3 的逆米尔斯比率显著,说明原模型存在自选择问题。控制逆米尔斯比率之后,模型 1 的治理科技指数与人才培养显著正相关,模型 2 的治理科技指数与科学研究显著正相关,模型 3 的治理科技指数与社会服务不相关,说明排除了自选择问题后,假设  $H_1$ 、 $H_2$  成立, $H_3$  不成立。模型 4~9 的逆米尔斯比率不显著,说明原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不影响原回归结论。原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语

本文在高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数字化治理水平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本文得到如下结论:①数字化治理在部分程度上正向影响高校高质量发展,具体表现在,高校数字化治理水平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发展具有正向影响,数字化治理水平对社会服务没有显著影响。②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部分削弱了数字化治理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技术发展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治理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关系,不能显著调节数字化治理与社会服务的关系;技术委托企业不确定性削弱了数字化治理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正向作用,不能显著削弱数字化治理对社会服务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一方面,在现有对高校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基础上,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方面量化剖析高校高质量发展内涵,弥补了以往研究主要基于宏观视角分析高校高质量发展的不足。另一方面,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数字化治理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探讨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通过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实现了对高校数字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定量分析,发展了相关理论,拓展了高校数字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相关方向的研究。

本文的结论具有重要启示。首先,高校应该继续大力推进数字化治理,将数字化建设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深度融合,发挥数字技术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健全数字化建设制度保障、资金保障与人才保障。其次,增加数字化技术在社会服务领域的运用,依托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建立起高校—社会的数字化社会服务链条体系,将面向社会重大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线上公开,进一步拓展社会服务的范围与层次。第三,做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机制,尤其是防御技术发展带来的数字化治理危机,逐步建立起数字体系建设规范与制度体系,在校内组建专业的数字治理运行团队,提高对合作委托企业的监督力度,建立起具有风险抵御机制的合作模式。

本文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局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首先,本文仅使用了高校层面的面板数据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进行测度,未来可结合高校社会影响、经济带动等方面的数据,进一步优化变量体系。其次,本文仅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方面衡量高校高质量发展水平,未来可结合高校职能,进一步延伸文化遗产、国际交流方面的研究。最后,本文选取样本数量有限,未来可扩大样本容量,增加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 参考文献:

- [1]郑磊. 数字治理的效度、温度和尺度[J]. 治理研究, 2021, 37(2).
- [2]赵中建. 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展望及其行动框架——'98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概述[J]. 上海高教研究, 1998(12):4-11.

[3]赵继,谢寅波. 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问题[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11):9-12.

[4]钟晓敏. 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论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5):90-94.

[5]王燕,吴蒙,李想. 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效率研究——基于超效率的三阶段DEA模型[J]. 教育发展研究, 2016, 36(1):39-47.

[6]谢娟. 教育数据治理的伦理框架:价值、向度与路径[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0, 32(5):15-24.

[7]孙立军,刘爱军,王琰. 论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8(11):35-39.

[8]戴勇,范明. 高校基础研究团队有效性及影响因素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27(13):134-137.

[9]陈和,刘交交.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高校科研团队科研动力影响因素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8, 38(19):89-95.

[10]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阿里云研究中心,智云实验室. 无边界触达——数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R]. 2021-3.

[11]杜斌. 大学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关联发展水平研究[D].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8.

[12]王富平. 地方高校社会服务模式有效性探析[J]. 教育评论, 2015(7):3-6.

[13]傅皓天,于斌,王凯. 环境不确定性、冗余资源与公司战略变革[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8, 39(3):92-105.

[14]马勇,石甘霖,刘云涛.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2, 43(1):2-8.

[15]刘飞,王欣亮. 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地方治理绩效:治理环境作用下的异质性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11):75-84.

[16]庞瑞芝,张帅,王群勇. 数字化能提升环境治理绩效吗?——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1(5):1-10.

[17]申慧慧,于鹏,吴联生. 国有股权、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J]. 经济研究, 2012, 47(7):113-126.

## The Impact of Digital Governance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 Zhi-fu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Digital governanc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e two important propositions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using the public panel data of dome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xternal technical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 partial impact. Among them, digital gover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alent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services; the uncertainty of the external technical environment has a partial moderating effect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mong them, such uncertainty weaken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governance on talent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service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lated research and theory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m to promote digital governanc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governa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certainty of the external technical environment

(责任编辑:范新菊)